

7242

8-7

8

GuiZhou
JiaoYu KeYan

8
贵州教育科研

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
《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
研究成果专集

5.1997

贵州教育科研

一九九七第五期
(总第 50 期)

目 录

主 编 刘旦元
副主编 缪学初(常务)
副主编 林开良

贵州省报刊准印号
01—K027 号

- 一、《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研究成果公报 (1)
- 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专家鉴定组鉴定意见 (4)
- 三、反贫困与实施初等义务教育
——《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课题研究总报告 (5)
- 四、《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背景调研总报告 (29)
- 五、推进贵州省贫困地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实践与启示 (42)
- 六、贵州省贫困地区复式教学发展研究
..... (51)
- 七、贵州省贫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发展的跨文化及对策思考 (62)
- 八、夯实基础,在较高水平上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73)
- 九、实施女童教育项目,促进民族贫困地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78)

G629.287.3
4-3

《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

课题成果公报

课题级别：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研究课题

课题学科分类：基础教育

课题负责人：刘旦元 中学高级教师 贵州省教科所副所长

主要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李 红 李小平 李金凤

朱翠娟 陈远鸿 陈国媛

杨继东 杨毓芳 安 岚

周 明 张学杰 张晓兰

张晏澜 赵 敏 侯彦芳

胡兆璋 高 宇 袁黔华

黄放鸣 李寿祥 伍朝忠

张成基 张伟中 曹 燕

彭广云 彭家云

一、课题由来

实施义务教育，是国家现代化的奠基工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条件。80年代中期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向我们提出了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实践表明，本世纪末，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地区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虽有一定的困难，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办得到的，而在贵州省这样的全国最贫困地区，本世纪末实施初等义务教育还尚有大量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到底是什么？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加快这些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步伐，使之在本世纪末实现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为全国实现“两基”作出贡献？这是贵州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提出的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教育科研要为教育实践服务。为了回答上述问题，1993年2月10日，贵州省教科所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了进行《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课题研究的申请。1993年3月

15日，规划办正式批准课题立项，要求尽快开题进行研究。

二、课题研究的目及指导思想

1、目的：通过课题的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全面分析影响贵州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主要因素，寻求使贫困地区不分性别、民族的适龄儿童能按规定年限受完初等义务教育的有效途径，探索在贫困地区大面积提高初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方法，总结贵州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历史进程中的成功经验，提供决策咨询，加快贵州实现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进而实现“普九”的进程。

2、指导思想：坚持以国家的教育方针，《义务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指导，服从于服务于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贵州在2000年前要实现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大政策，立足于贵州省贫困地区（主要是贫困县）的实际，在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中存在的特殊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一定的突破。

三、课题研究的主要办法

本课题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总的方法论。具体运用了以下科研方法：

1、调查法：本课题组织了多次调查活动，其中集中大型的调查活动有三次。每次调查活动都拟定了调查提纲，通过访问、座谈、查阅有关文献资料、问卷等方式，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经过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数理统计等手段，从中找出了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本课题提出的《背景调研总报告》是主要运用调查法得到的成果。

2、经验总结法：本课题运用经验总结法时是与历史法相结合的。课题研究中大量收集与研究了贵州普及初等教育及初等义务教育几十年间的有关史料，如省、地、县政府的有关法令、法规、决议、规划、文件等，并与贵州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实践相结合，

dqwu05/19

从中总结概括出贵州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经验。

3、个案法：本课题确定了五个贫困但经济发展水平又有较大差别的区县作研究样本，其中又对贵阳市花溪区和黔东南州榕江县重点作个案研究。在总课题组的指导下，以样本县的研究人员为主，写出了三个个案研究报告。

4、行动研究法：本课题研究中始终坚持研究与实践相结合，重在实践参与的原则。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实际参加了贵州省十余个贫困县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验收工作，既注意收集、总结了这些县的经验，又注意将研究的成果用于指导这些县的工作。在复式教学的研究中，行动研究法运用更多，即：发现问题——鉴定问题——研究文献——拟定行动计划——设立假论——实施行动——评价效果。这种研究方法有效地促进了贫困地区复式教学的巩固和发展。

四、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取得的社会效益

1、本课题是根据贵州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提出来的，是针对性很强的一项研究。贵州是全国最穷的省之一，在这样的省对其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对贵州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全国其它类似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也有借鉴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可以看成是“西部九年义务教育研究”课题的继续和深化，进一步丰富了西部八省区研究的成果，对国家施行义务教育法，分类推进实施义务教育的工作，对党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指导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均有参考价值。

2、本课题深入系统地分析了贵州省贫困地区初等教育发展的背景，指出不利的区位条件、不利的自然环境、自给但不能自足的落后经济、迟缓、薄弱与功能不协调的社会发展状况，是综合影响贫困地区初等教育发展的诸因素。分析的详尽和透彻，是类似的研究中少有的。

本课题还深入剖析了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现状，概括了贫困地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一般规律。令人信服地指出贵州教育经费总量的供给不足从而导致教育投入绝对量上的“欠帐”，不是贵州省的努力不够，而是“穷省办大教育”造成的，因而，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要自我努力与国家扶持相结合。

本课题提出的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战略选择与对策探讨，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3、研究成果较全面地反映了贵州省推进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历史进程及所积累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已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贫困县巩固成果，尚未实现普及的贫困县实现普及，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对全省进一步按规划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4、对贵州省贫困地区初等教育存在的特殊问题——女童教育问题和复式教学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边研究，边实践，边推动，这种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促进了贵州省女童教育与复式教学在科学基础上的发展。女童教育研究在贫困地区女童的心理发展研究方面，有一定的突破。复式教学研究在传播和借鉴亚太地区改革和发展复式教学的理论和经验方面，很有特色，取得较大成果，曾在96年11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与国家教委基教司联合召开的全国复式教学研讨会上作大会交流。

五、尚待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理论与实际问题

1、贵州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到2000年时，真正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这是教育科研工作者必须老老实实回答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行政的压力，法律的压力对各地推进初等义务教育的实施起到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但为了确保在规定的期限内实现普及，显示“政绩”，相当一些地方的“政绩”虚假的成分不少，虚报浮夸的现象严重存在。根据课题组对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这些地方在2000年前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它们却能如期甚至提前接受验收。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本课题还应从这方面深入调查研究，拿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事实材料和结论供决策者参阅，以使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2、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要么是对教育毫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漠不关心；要么是对教育的看法发生扭曲，把教育当作子女跳“农门”的希望。针对这种社会心理，本课题还应进一步研究边远贫困地区初等义务教育的主要功能及其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

3、本课题已通过专家鉴定组鉴定。专家们对课

题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课题研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成果还比较粗糙,二是总论与分论的论点论据不能前后呼应,三是对策

研究还未充分展开。课题组将针对这些问题,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成果。

六、主要研究成果目录

成果名称	形式	字数	主要撰稿人
1、反贫困与初等义务教育研究	研究报告	50,000	陈远鸿 张学杰
2、《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背景调研总报告	调查报告	23,000	刘旦元 李 红
3、推进贵州省贫困地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实践与启示	专题研究报告	17,000	刘旦元 侯彦芳
4、贵州省贫困地区复式教学发展研究	专题研究报告	16,000	刘旦元 高 宇
5、贵州省复式教学管理暂行办法	省教委文件	4,000	刘旦元 高 宇
6、贵州省贫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发展的跨文化研究及对策思考	专题研究报告	19,000	张学杰 陈远鸿
7、夯实基础,在较高水平基础上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个案研究报告	7,500	张成基
8、民族贫困地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研究	个案研究报告	8,000	彭家云

贵州省教科所《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课题组

1997年12月18日

贵州省教科所《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课题组

贵州省教科所《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课题组

1998年1月1日

对《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

课题成果的鉴定意见

专家组在认真审读课题组提供的《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报告》和《课题研究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意见:

一、该课题研究具有四个显著特点:

1、课题研究指导思想明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该研究从贵州省情出发,审视贫困地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侧重对双语教学、复式教学、非正规教育、女童教育等突出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对策,这对其它贫困地区也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课题研究方法科学、多样。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比较深入,课题研究的事实基础比较扎实。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运用了统计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贵州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初等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由此进一步分析了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一般规律和难点,其结论有较为普遍的意义。此外,课题组还注重个案研究,使研究更加贴近实际。特别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边研究,边指导、推进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工作,提高了研究的实效性。

3、课题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某些论点,为独到见解,有创新意义。例如,认为“解决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问题,已成为解决当前贫困地区温饱问题、

社会发展问题、多民族共同繁荣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又如,认为“在困难的情况下,是否尽到主观的努力,是很重要的”。再如,提出“在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应坚持多层次、多形式、不拘一格办学的形式,但贵州省贫困地区多数仍主要是单一的全日制小学这种办学形式。非正规教育的办学形式……主要停留在口头上”等等。复式教学发展研究的成果具有创新意义。

4、课题组成员工作积极努力,在人员变动情况下,重新组织力量,坚持把课题研究搞完,基本完成了研究任务,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鉴于以上多点,专家组同意通过鉴定。

三、课题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总论与分论不相呼应,有些论点相互矛盾;有些对策内容较空泛,不具体;有些观点的科学性存在问题,如认为“贫困地区初等义务教育对乡村文化的改造、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有限”,教育与经济的发展在贫困地区都是“恶性循环”等等。为此建议,在研究成果出版或公开发表前,要作进一步修改。

专家鉴定组组长卓晴君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专家鉴定组成员

张民生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副主任	研究员
万中义	四川省教科所	所长	副教授
张铁道	甘肃省教科所	所长	中学高级教师
马毓勤	宁夏教科所	所长	副研究员
杨贵珠	贵州省教育委员会	副主任	
吴郁英	贵州省政府督导室	主任	
皮俊林	贵州省教委基教处	处长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同意专家鉴定意见

1998年1月16日

反贫困与实施初等义务教育

——《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课题研究总报告

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今天,贫困问题不但没有相对缓和,反而日渐恶化,世界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贫困人口有增无减。同世界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改革开放15年来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由78年的25%下降到10%,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由于各地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别,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使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到1995年底,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9200万人,占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10%。在这92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中,分布在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为8065.5万,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87%。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592个贫困县中,有487个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占82%;分布在农村绝对贫困的8065.5万人口中,有6640万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占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83%。因此,“西部”成为“贫困地区”的代名词。

实践证明:贫困和非贫困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差异,而是两种地区在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文化、社区、人口的心理状况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和互动的结果。显然,经济发展的滞后、群众生活的困苦并不是孤立运转的,必然导致教育发展滞后,教育的滞后又影响这些地区的脱贫致富。因此,在实施“反贫困”战略的今天,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必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教育在反贫困中的作用也越来越被大多数人认同。

贵州是贫困地区经济、教育发展的缩影,是研究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样板地。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的592个贫困县中,贵州省有48个,占8.1%;1995年贵州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100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29.4%,占全国贫困总人口的10.9%,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12.5%;并且,年人均纯年收入低于300元的极贫困人口746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21.6%。在贵州省这样的贫困地区要在本世纪末完全普及初等义务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承担了国家教委“八·五”重点科研课题——“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研究任务。课题组从自然、经济、社会、民族、教育视野的广角,以贵州省的贫困县为大背景,选取贵阳市郊的花溪区、地处岩溶发育典型的贫困县普定县和榕江、独山、威宁三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等作为样本县,并将黔东南自治州的剑河县、雷山县两个极贫困县和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市作为参照系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一、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背景分析

要研究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就必须对贫困地区整个自然、社会经济系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通过我们的研究认为,贫困地区在实施义务教育时其背景条件有如下特征:

(一)不利的区位条件——边远性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区位成为市场经济的资源要素之一。我们居住的地球空间的每一个地方的资源配置情况并不都是均等的,并不是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投入相同的资金就可以获得一样的效益。因此,市场经济首先寻找“最佳的区位”——即我们常说的“最佳投资的空间或者地方”。从一定区域范围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位”因素重于“自然资源”因素,象自然资源贫乏的日本、新加坡、香港和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韩国、台湾等地经济的高速发展,无不显示“区位”在发展本地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其共同的区位优势都处于“环太平洋经济带”上;从国内情况来看也如此,中国的矿产资源分布的重心偏向中西部地区,沿海省市的矿产

资源相对贫乏,矿产资源和能源需要从中西部地区调入,而这些省市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省市——这与东部沿海省市位于太平洋西海岸,是世界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一部分密不可分。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区位不受到重视,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将会成为一个地区发展的绝对优势,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取决于“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视程度”,当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人们过问得较少。

以往一些类似的研究报告或者成果中,基本上是沿袭“资源开发——经济发展——教育发展”的模式展开的,忽视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大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顾及到市场经济一些本质属性的东西。如果将研究对象放到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进行考察,不难解释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正在拉大的发展趋势,也不难解释我国贫困地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贫困地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利“区位”,通常表现为远离经济中心,即我们常说的“边远性”,换句话说就是贫困地区的“边远性”是由于“区位”导致的。这种边远性通常表现为远离经济中心或者政治中心。具体表现在:

1、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都远离世界经济中心

从全球的宏观尺度看,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有三个欣欣向荣的地方,一个是以英、法、德、意等国为核心的世界传统的经济中心欧洲;一个是本世纪初才崛起的世界经济中心北美洲五大湖沿岸地区;再一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成为世界经济巨人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近二十年经济迅速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南太平洋上澳大利亚以及北美洲西海岸地区(美国和加拿大),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环太平洋经济圈”。这三个世界性经济区域创造了当今世界财富的80%以上。

我国地处太平洋西海岸,沿海省市充分利用环太平洋经济圈经济发展的“连动”作用,经济迅速发展,逐步成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一部分。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就缺乏这种地缘优势。

位于祖国大西南的贵州,远离世界经济中心,最东端到太平洋西岸的空中直线距离1100千米,最南端到北部湾的空中直线距离550千米,是一个“不靠

海”(批靠近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内陆省份。

2、贵州远离中国的工业地区和工业地带

从全国范围这个中观尺度来看贵州省的区位,不但远离世界经济中心,距离国内的经济中心也较远。从我国工业的发展和布局看,我国形成了七个主要的工业基地和工业地带,它们是我国经济的骨干区域,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已形成的3个工业基地是:辽中南重工业基地、京津唐工业基地和沪宁杭工业基地;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珠江三角洲工业基地以及3个工业地带,它们是:沿海工业地带、长江沿岸工业地带和陇海——兰新工业地带。很明显,7个工业基地和地带中有五个在沿海,两个工业地带(长江沿岸工业地带和陇海——兰新工业地带)的一部分属于中西部地区,贵州距这七个工业基地或者工业地带都比较远,相对较近的是“长江沿岸工业地带”,但贵州经济的发展没有直接成为长江沿岸工业地带的一部分,仅仅只有贵州的六盘水属于长江沿岸工业地带之下的攀西工业区(以攀枝花、西昌、六盘水为主体建成钢铁、煤炭工业区)的一部分。可见贵州既不沿海,也不沿江(靠近国内经济中心),处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边远地区,处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援地区。

3、绝大部分贫困县都远离地方经济中心

从贵州省范围的微观尺度看,作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有六盘水市和贵阳市两个,贵阳市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地;六盘水市是新兴的工业城市,煤钢开发的战略基地。通过在全省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测算表明:我省的48个贫困县中距离这两个区域经济中心(也包含边远地区贫困县与邻省相应的经济中心的距离)的距离在50千米以内的1个,占贫困县数2%;50—100千米的6个,占12.5%;100—150千米的11个,占22.9%;150—200千米的15个,占31.3%。200—250千米的3个,250—300千米的2个;相反,我省大多数非贫困县(市、区)多紧靠区域经济中心。

贫困地区处于不利的区位,不但对经济发展和物资传输不利,而且对教育发展以及信息的传递都有不利的影晌,尤其不利于贫困地区接受城市和发达地区教育观念、教育方法和手段的正效辐射,从而障碍了自身的发展与提高。

(二)不利的自然环境——封闭性、分散性、恶劣性

人类社会的周围是环境,这种环境有两类:一是“天生”的自然环境,二是人类社会自己“营造”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在地球上并非处处一样,不同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作为构成自然环境要素的地形、气候、水文、矿产、能源等等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越高,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自然界的不利因素对人类的制约越小;反之越大。

1. 贫困地区多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山区、干旱半干旱地区(牧区、沙漠、荒漠、戈壁)、高寒地区、荒岛、热带亚热带丛林等地区。

(1) 从全国 592 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所处的自然环境看,位于山区的 323 个,占 54.56%;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 219 个,占 36.99%;其它占 8.45%。

(2) 从贫困省贵州来看,属于典型的高原山区。全省地貌分为高原、高中山、中山、低中山、丘陵和河谷坝子(盆地)等七种类型,分别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1.82%、6.68%、23.78%、36.1%、20.62%、9.6% 和 1.4%。贵州与全国的地貌构成相比,属于典型的山区省份,广义的山地(丘陵和山地合计)占土地面积的比例,贵州高于全国 53 个百分点。

(3) 从省内 48 个贫困县的地貌构成情况看,与全省相比,山地、高原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丘陵和河谷坝子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仅占全省土地面积 1.4% 的河谷坝子和占 9.6% 的丘陵是贵州省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区,这里土层深厚,地下埋藏较浅,排灌方便,水热土肥光条件好,是城市县镇所在地,是全省非贫困地区。

从贵州的地形分布与经济发展或者与贫困地区的分布看,占我省土地面积 11% 的丘陵和坝子是我省经济最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经济欠发达、财政补贴县和贫困县主要分布在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87.18% 的山区。

我们通过作贵州省 87 个县的山地面积比重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4 年)的相关分析发现:呈现出经济上越贫困山地面积占全县的土地面积比重越高,而且高中山和中山的比例也就越大,贫困县主要分布在高中山、中山和低中山比例较高的地区。

贵州省贫困县的分布基本上沿袭高大山脉的走向,呈现集中联片分布的势态。贵州西部为乌蒙山区,这里山势高大,是我省贫困县集中地区之一,占

全省贫困县数的 30%;横亘贵州中部和南部的苗岭面积最大,是我省贫困县集中分布连片的地区,有 45% 的贫困县分布在这一地区。横贯贵州东北部和北部的是武陵山和大娄山,松桃自治县、正安县、道真自治县、习水县等贫困县分布其中。全省 48 个贫困县中有 44 个分布在大山之中。例如位于苗岭中段的榕江县山地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98.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

高山深谷直接导致地理小环境的封闭性和居住分散性,这些地形对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不利影响是:

由于贫困地区多深居大山峡谷之中,坡陡平地少,直接影响学校的建筑成本。根据测算和我省经验表明:在 30°—40° 的山坡上修建砖混结构的校舍,开山凿石挖填土石等地基工程造价至少是房屋造价的一倍或以上。剑河县除位于柳川镇清水江河谷阶地上的城关小学有运动场外,其他学校的校舍均建在山坡上,无运动场地。显而易见,在山区办教育学校建设成本远远高于平原、丘陵、盆地地区,并且学校的建设规模会受到较大的制约。

学校规模小,学校服务半径小 经过对全省各种地形条件下小学校的服务半径测算得知,高原和河谷坝子地貌区内的小学平均校点服务范围为 10 平方千米,高中山地貌区内的小学平均校点服务范围是 5 平方千米,中低山地貌区内的小学校点平均服务范围为 6 平方千米。1994 年全省小学校点规模为 134 人,贵州西部贫困县水城为 126 人,北部贫困县习水为 112 人,东南部的贫困县榕江为 80 人,南部的贫困县独山县为 88 人,在全省 48 个贫困县中,有 45 个贫困县的小学校点规模在 70—130 人之间。由此看来,贫困地区学校规模小,有其“自然”的客观因素。

2. 其他自然条件——恶劣的生存环境

贵州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温润多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这种温和多雨、雨热同季的气候适合多种植物的生长,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按理贵州省占有这样的“天时”,不应该出现“吃不饱饭”的问题。但贵州不占“地利”的优势,“天”和“地”之间组合起来的“生态环境”使多数贫困地区处于“生存恶劣”的境地。

在我省 48 个贫困县中,除黔东南州的 12 个贫困县位于非可溶岩地区,森林覆盖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外,其余 75%的贫困县位于岩溶山区,水土流失面积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在 50%~90%之间,最低的武陵山区的铜仁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54%,其贫困县松桃自治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67%;我省南部、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贫困县情况更为严重。位于黔中部的普定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71%,大部分乡村座落在“石山”之间或者“石山”之上。其次,在这些岩溶广泛发育的地区,虽然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下,年降水量超过 1000 毫米,但是到处分布溶斗、伏流,洼地上的土壤保水差。造成“天上降水丰富”而干旱困扰农业生产,人畜饮水困难的局面。再次,可耕种的土地少而分散,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农田基本设施不健全,保灌面积不到耕地面积的 20%,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遇到“风调雨顺”之年,可解决温饱,稍有“风雨失调”就返贫。

分布在石灰岩山区的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恶劣,要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我省主要采取的是“移”、“改”措施。“移”就是将这些不适宜人口居住的贫困地区的人口有计划地转移到其他地区。由于我省经济发展较慢,城市和乡镇企业吸收能力较弱,往省内其他地区的农村转移更不现实,本来人均耕地就不足 1 亩,可再开垦的耕地有限。通常都是在扶贫开发机构的协调下往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转移,但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低,转移的困难较大,如何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促进他们在空间上的有效转移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贵州省的气候、生态环境不仅与农业生产相关联,对贫困山区办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夏季的暴雨和冰雹对学校设施的破坏。我省坝子多是城市、县镇以及乡镇所在地。坝区的小学校舍多砖混结构,抗风雨能力较强。而广大山区小学校舍多为木结构、土结构,抗风雨能力极差。以样本县独山县的羊风乡来看,由于降水的 80%集中在 5—9 月,并且多大雨和暴雨。1993 年乡政府所在地的坝区的砖混、砖木结构的小学校舍占校舍面积的 78.6%,而此以外的地区的相同结构的小学校舍仅占校舍面积的 23.1%。在同年夏季的暴雨中,水毁校舍面积两者分别占 7.8%和 43.3%。由于多数山区校舍建在坡上、山上,时时伴随有山洪、泥石流、滑坡危及校舍和威胁师生安全。该乡每年需修缮水毁校舍的经费在 8—17 万元之间。

3、贫困地区自然资源特征

(1)贫困地区自然资源数量不丰不欠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往人们有一个错觉就是认为:贫困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通过我们的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根据自然资源的属性和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使用上的不同,分为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和矿产资源等几个方面。

从土地资源看,土地资源是人类居住和利用的陆地表层部分,是人类生存、活动的载体。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在黑河市到云南腾冲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51 人,是西部地区的 22 倍以上。如果就以此说西部贫困地区土地资源丰富是不全面的。根据人类对土地的利用又可以分为耕地、草原或者草场、林地、建筑工矿交通用地和滩涂沼泽荒漠。耕地、林地(我国三大林区中的大小兴安岭林区和东南林区位于东部地区)、建筑工矿交通用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发达地区,而广大西部贫困地区占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却是草原或者草场和沼泽荒漠。应该说,贫困地区土地资源绝对数量大,而“质地差”,多沙漠荒漠、寒漠、戈壁、沙漠化土地、永久积雪冰川、石质裸露山地等。可见,贫困地区的土地资源地广人稀、能有效利用的部分并不多。

气候资源、水资源我国东部地区明显优于西部贫困地区,我国东部地处季风区,雨热同季有利于农业生产;而广大西部贫困地区多是内流区,河流总水量不到全国河流总水量的 5%,可以说干旱地区基本上是贫困地区。而且广大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资源不配套,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光、热、水等不配套;加上低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和缺乏基本的农田水利工程,吃饭基本上是“靠天”,农业生产很不稳定,贫困地区多属灾区。

从矿产资源占有的数量和种类看,我国矿产资源的(绝对数量)分布重心略偏向中西部,但应看到大多数种类的矿产资源并非西部贫困地区所独有;而就一个省的范围尺度看,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占有的矿产资源数量和种类各有千秋。贵州省地质构造复杂,地层齐全,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品种繁多,在已发现的 82 个矿种中有 74 种矿产已探明储量,约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矿种的 56%,居全国前五位的就有 29 种,其中汞、磷、铝、锑、锰等储量居全国前列。将贵州省主要矿产资源按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分布上看,汞的保有储量为 35283.7

吨,占全国总储量的 61.8%,居全国第一位,但全省汞矿储量的 37.6%分布在贫困地区(主要在务川自治县、松桃自治县、丹寨县、兴仁县等地),而大部分汞矿分布在我省经济较发达的贵阳市的开阳县、铜仁市和万山特区(汞矿),贵州磷矿保有储量为 26.54 亿吨,折合标准矿石量为 18.28 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 19%,居全国第三位,尤其是富磷矿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级品富磷矿为 4.6 亿吨,占全国富矿总量的 48.9%,使贵州成为全国三大磷矿基地之一。丰富的磷矿资源的 87.3%分布在非贫困县,只有少量的磷矿资源出露于贫困地区的织金县、麻江县、雷山县等地;贵州省的贫困地区占有最多的矿产资源是煤,煤炭的保有储量为 502 亿吨,远景储量 2679 亿吨,居全国各省区的第五位,全省含煤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40%,其中 71.8%的煤炭资源分布在贫困地区,只有近 30%的煤炭资源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贵阳近郊煤田和黔北煤田;贵州铝矿的保有储量为 4.06 亿吨,占全国总量的 14.8%,居全国第二位,全省铝土矿资源的 93.6%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的贵阳近郊。其次,如贵州锑矿的 96.1%和锰矿的 21.3%分布在贫困地区。此外,有 64.8%的水力资源和 71.3%的森林资源分布在贫困地区。可见,贫困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一说是站不住脚的,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矿产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各有千秋!

而且矿产资源优势要转变成经济优势,还要取决于开发资金、市场对该矿产资源的需求情况、区位条件、矿产资源埋藏和开采条件、技术条件、相关产业的配套程度以及交通、通讯、公共设施等基础配套设施的情况,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现阶段的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贫困地区某些丰富的资源也只是其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因此,贫困地区对资源的占有只是一种“潜在的经济优势”,而非贫困地区对矿产资源的占有多表现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应该说两种“优势”是有本质的差别,但又有一定的联系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西部贫困地区自然资源的组合不及东部中部地区,西部贫困地区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组合关系更不及东部地区,要形成为生产力还需要教育等部门的配合;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污染及破坏,贫困地区比非贫困地区表现更明显。

(三)贫困地区经济特征——自给但不能自足

从经济发展的纵向上看,贵州全省以及各个贫困县经济都在不断发展,并且经济实力都得到增强。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给贵州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健康、持续发展。1995 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 636.4 亿元,是 1978 年 46.62 亿元的 13.65 倍(当年价,下同)。1978 年到 1995 年 17 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递增率为 16.1%,高于我省前 26 年(1958 年—1978 年)年均增长率 8.2 个百分点。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收入也随之增长,从 1978 年 6.26 亿元上升到 1995 年的 38.51 亿元,增长了 5.15 倍,年均增长率为 10.12%。同样贵州省的贫困地区的经济形势与全国和全省其他地方一样取得长足发展,48 个贫困县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7.23 亿元增长到 1995 年的 86.15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15.1%,略低于全省平均年增长率。地方经济实力得到增强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1995 年全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087 元;1995 年贫困户所占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95.8%(当时标准:人均年纯收入低于 200 元)下降为 35.7%(现今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500 元)。多数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有近 10%的农户由温饱走向小康。但是,贵州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发展水平低,贫困面较大,问题较多。这对贵州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产生“瓶颈”性的制约作用。

1、经济基础薄弱,贫困面大

由于历史及地理等诸多原因,贵州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的地位,与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在西部地区也处于靠后的位置,是全国经济最不发达的省份之一。贵州省土地面积为 176128 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83%,1995 年人口 3508 万人,占同年全国人口总数的 2.9%,而 1995 年贵州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636.4 亿元,仅占同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 57600 亿元的 1.1%。1995 年贵州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814.14 元,仅为同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4779.87 元的 37.95%,居全国倒数第一位;与东部地区沿海十省市相比,只是其人均水平的 25.8%;1995 年贵州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是西部地区的 74.8%。与沿海发达省市相比,1995 年广东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贵州省的 4.28 倍,上海是贵州省的 8.79 倍。

从省内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对比来看,1995年48个贫困县共共创国民生产总值的147.9亿元,仅占全国同年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的23.2%,即48个贫困县创造的社会财富大致和贵阳市(1995年数据,不含三县一市)相当。48个贫困县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88.82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9%。五个样本县中的四个贫困县榕江县、独山县、普定县和威宁自治县199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70.7%、90.3%、44.8%和53.2%。经济发展水平低必然导致群众收入少,1995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087元,仅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61.3%,为东部地区的43.2%,为中部地区的84.5%,是西部地区的91.4%。

贵州省不但经济基础薄弱,贫困面也比较大,贵州省被列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的贫困县数占全省8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55.8%,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再从贫困人口看情况也如此,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人口全国为8000万人,贵州省为1252万人,占全国的15.7%,占西部地区的18.9%;以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指标衡量,全国贫困人口1664万人中,有1143.86万人属于贫困人口,48个贫困县中贫困人口数占全省贫困人口的91.34%,其余108.5万贫困人口零散分布在其他非贫困县之中。48个贫困县土地面积约为110000平方千米,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2.45%。作为一个省贫困面这样大,在全国来说都是少有的。

2、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

尽管我国或者我省在改革开放中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在市场经济机制的拉动下,社会财富的增加量在经济发达地区远远高于贫困地区,即穷的地方相对越来越穷,富的地方越来越富。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和17%,到1994年则变为61%、26%和13%;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看,以东部为1,东、中、西部地区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0.8:0.7,到1994年扩大为1:0.65:0.52。1990年到199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长率为4.27%、中部地区为0.28%、西部地区则为-0.73%。就是说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和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在逐渐拉大。1978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8元,为全国平均水平133.57元的80.86%,为同年广东省182.30元的64.02%,而到1995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占全国和广东省的比例为58.73%和32.16%。1986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95.8%下降到18.9%(除去已脱贫人口,下同),全省贫困县只有26个;到1991年全省贫困县上升为31个,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26.4%,约占全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1992年全省贫困县个数增加到46个,贫困人口扩大到占总人口的31.8%;到1992年全省贫困县数又增至48个,并一直保持至今。

通过分组(贫困县、发展中县和发达县)考察1990年~1995年全省部分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位次情况变化发现:多数贫困县在1990~1995年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位次在后移;只有少数贫困县象普定县那样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位次在前移。经济发达的县市区基本上保持全省前15位的位置。如果作全省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异性分析,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1990年全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35元,非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47元,距平值+112元;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6元,距平值为-69元,差异值为181元;同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87元,非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29元,距平值为+142元;1995年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89元,距平值为-498元,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了640元!差距值扩大了3.54倍,即从1990年非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贫困县的1.49倍扩大到了1995年的2.07倍;1995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云岩区为1721元,是全省最低的台江县332元的5.18倍,两者相差了1389元,比1990年的极端值拉大了93元。

3、自给但不能自足

贵州经济发展处于自给但不能自足的水平。无论从政府财政收支情况看,还是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看都具有这个特点,尤以贫困地区为甚。

(1)各级政府财力单薄。1978年贵州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23.30元,仅为全国人均财政收入116.54

元的 19.99%，1995 年年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109.78 元，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 30%。再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贵州省从 1978 年为 15.0% 上升为 1995 年的 16.7%，全国同期为 37.2% 和 24.3%，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从贵州省贫困县乡政府的财力状况看，县乡级财力薄于全省平均水平，而且乡级财政收入不稳定。例如，样本县榕江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 95.79 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 109.78 元的 87.23%，为经济较发达的样本县花溪区年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170.64 元的 56.14%；而榕江县下属的朗洞镇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 12.84 元，分别为县级、省级水平的 13.40% 和 11.70%。

省、县、乡级财力薄弱，使得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地位难以落实；

而且，义务教育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贫困地区实施起来难度较大。

(2) 地方财政对上一级财政的依赖性较强，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贵州省除了在 1962 年以前地方财政收入大于支出外，从那时起一直沿袭至今都是地方财政收入小于财政总支出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总支出之比是逐年升高的。1995 年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为 38.51 亿元，财政支出为 84.52 亿元，财政收支比 1:2.19，是全国地方财政收支比最高的省区之一。如此高的财政收支比，只有依赖上级财政的补助，中央财政对贵州省的财政补贴比例在“六五”期间为 1:0.988，即基本上是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 1 元，中央就补助 1 元，在这个时期中央财政对贵州的补贴比例增长速度高达 12.01%！在“七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贵州的补贴比例有所下降，为 1:0.534，补贴比例的增长速度为 3.93%；到“八五”期间又有所上升。从贫困地区县乡级地方财政收支比情况看，样本县榕江县及其朗洞镇地方财政收支比例分别为 1:1.52 和 1:1.11；样本县独山县羊凤乡为 1:1.44。

(3) 贵州省财政补贴面大，在全省 86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仅有 16 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支盈余，占全省县数的 18.6%；有 11 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支基本持平；其余 59 个县地方财政收入小于支出，属于财政赤字县需上级财政补贴，即全省地方财政赤字的县数占全省总县数的 68.6%，48 个贫困县全部属于财政补贴县。

(4) 贵州省县区乡各级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

政”。“六五”和“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建设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 53.0% 和 51.6%，而相应时期贵州省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 22.8% 和 14.6%，分别为同期全国的 43.0% 和 28.3%；榕江县及其朗洞镇 1993 年建设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 13.8% 和 4.1%；而独山县羊凤乡 1993 年和 1994 年乡地方财政收入全部用于“保工资”，经济建设费支出为 0。可见，贵州省省县乡尤其是贫困地区县乡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这种现象依省—县—乡序表现愈加突出。“吃饭财政”反映在对教育的拨款上的共同特征基本上只能保障教育事业经费中的“人头费”，各县“人头费”占财政对教育拨款的 80% 以上（包括非贫困县）。

(5) 贫困地区县乡两级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收比重高、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稳定性差。在贵州省内经济较发达的花溪区农业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3.5%，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3.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8.8% 的 5.3 个百分点，工商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94.1%；而贫困县榕江县农业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19.2%，分别是花溪区和全省平均水平的 5.5 倍和 2.2 倍！从乡级财政情况看，农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更高，榕江县朗洞镇和独山县羊凤乡农业税收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别为 68.5% 和 81.4%。因此，在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税的贫困地区，总是在地方财力薄弱（传统农业附加值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农产品生长周期较长）——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差（传统农业对“天”的依赖性较强）怪圈中循环。“老天爷一感冒”，不但群众吃饭成了问题，地方财政收入也十分困难，教育拨款随之出现问题。难怪贫困地区的干部和群众都说“吃饭看天气，教书也看天气”。

总之，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主体地位能够得到落实，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出基本上能够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在集资办教育上是企业、政府出大头，群众实际支出比例并不高；而内地尤其是贫困地区表现为：财政穷，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出基本上是保工资保吃饭，企业穷，群众穷，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是政府和群众出大头。

4. 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1) 地方工业基础薄弱，乡镇企业不发达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工业在一个地区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小，可以反映出这个地区的物

质文明程度和社会化程度。在“八五”期间我国农业产值(大农业,下同)占社会总产值的18.6%,而同时贵州省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30.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5个百分点;从贵州省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情况看,经济比较发达的花溪区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39.6%,贫困县榕江县为82.1%。可见贫困地区是以受自然条件制约、在土地上经营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与沿海地区相比乡镇企业不发达,“八五”期间贵州省乡镇企业产值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也不到西部平均水平的一半;而贫困地区的人均乡镇企业产值又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榕江县及其朗洞镇1995年人均乡镇企业产值分别为244.69元和160.08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3.7%和28.3%;与全国和发达地区相比比例更低。可见,贫困地区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社会化程度都很低。

(2)生产经营的社会化程度低 从我们对五个样本县249户农村家庭进行的综合调查情况看,更足以说明贫困地区自然经济的属性。

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方面,农村居民单纯靠工资作为收入来源的是极少数家庭,仅占调查农户的3.2%,主要是为农村经济社会服务的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和村干部等;半边农户的家庭也是少数,只占调查户数的3.2%;而大多数农户的经济来源是单纯靠种植业,占调查农户的67.9%,其次是从事种植业的同时,从事一些简单的副业生产,如采集药材、山珍野果、编织筐篓、修理农具等等。

从经营的土地范围看,经营土地在10亩及其以上的农户只有3户,只占总户数的1.2%,主要是承包的林地;每户经营土地在5—10亩的农户为19户,占总户数的7.6%,这部分农户经营的土地中除大部分是耕地外,还有少部分的草地、鱼塘或者荒山;剩余的227户农户局限在每户不到5亩地的土地上从事传统的种植业。

从生产工具看,有耕牛的农户236户,占总户数的94.8%;有传统农业生产工具锄头、镰刀、铁犁的农户为100%;所有调查农户都没有拖拉机、脱粒机、抽水机等现代农业生产工具,只有花溪区的2户农户有“磨房”、3户有畜力车、5户有人力车,其余四县合计拥有畜力车和人力车的农户数分别为2户和4户。

很明显:贫困地区农民基本上局限在狭小的土

地上,主要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从事传统的农业(种植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和社会化程度都较低。

(3)自给不能自足

再从所调查农户的生活资料来源看,粮食自种自食而不能自足。一年收成的粮食够吃的为64户,占总户数的25.7%(调查户中有40户非贫困户,花溪区有少部分从事蔬菜种植农户);缺粮一个月的农户23户,占总户数的9.2%;缺粮两个月的农户18户,占总户数的7.2%;缺粮三个月的农户37户,占总户数的14.9%;缺粮三个月以上的农户107户,占总户数的43%。可见,贫困地区的群众生活还处于自给不能自足的境地,这种自给自食而不能自足的种植业是贫困地区农民经济的主要来源;大多数群众的现金收入或者穿衣、盐、米(购买几个缺粮月的粮食)、学费主要依赖于家庭小规模饲养。在调查的249户中,家中养不起猪,只养得起几只鸡的农户为53户,占调查总户数21.3%;饲养2头及以下猪的农户136户,占调查总户数的54.6%;养3头以上的为53户,占调查总户数的21%,另有几户调查户未养猪。

(4)贫困地区农户的纯收入中,大部分是“实物”收入,“货币”收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从统计数据中可印证这一事实,1995年我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087元中,有437元来自于实物收入,占年人均纯收入的40.2%,其余的650元才是现金收入。因此,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现金所占比重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中现金收入所占比重在90%以上。

贫困地区这种现金收入占纯收入比重低的情况,在经济上反映出自然经济的成分高,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低,“货币”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不突出;而自耕自食、以物易物小农经济程度高。这种比较封闭的小农经济对当地教育发展会产生不良影响,对教育投资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贫困地区儿童上学以实物鸡蛋、粮食等作为杂费交纳,而教师尤其是民办教师得到的报酬并不全是“货币”;群众集资办学中相当部分是“实物”和“劳力”。如剑河县久仰乡的民办教师每月的报酬是乡政府补助的35元钱和村委会补助的50斤大米;另一方面,群众集资办学上并不表现为货币,这是与沿海地区的不同之处。例如榕江县朗洞镇1990年—1993年的教育集资142290元,其中现金9.7万元,占集资额的68.

17%，木料 129 立方米，树皮 990 平方米（我省黔东南州多数苗族村寨用树皮当瓦盖房），投工 24050 个。

5. 开放程度低

在“八五”期间国家实际利用的外资 1600 亿美元中，东部沿海地区占 87.9%；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 7.2% 和 4.9%。全省改革开放 15 年（1978—1993 年）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累计只有 3.09 亿美元，贵州省 15 年利用外资的总额不及全国“八五”期间的 0.2%。到 1995 年底我省 48 个贫困县无一外商投资项目。从进出口贸易来看，我国“八五”期间进出口总额超过 10000 亿美元。1995 年广东省出口总值为 565 亿美元，贵州省同年仅为 4.3 亿美元，是广东省的 0.76%。而 48 个贫困县同年的出口总额不到全省总额的零头。

（四）贫困地区社会发展——迟缓性、薄弱性和功能的不完整性与不协调性

1. 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功能的角度看，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较，具有迟缓性、薄弱性和社会功能的不协调性等特点

由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居住地的边远性、封闭性和分散性及其经济发展的缓慢性，必然导致社会发育的迟缓性。

正是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各项事业投入不足，欠帐较多，贫困地区呈现社会发育的薄弱性和功能的不健全性。

2. 贫困地区卫生保健设施较差

人们卫生保健意识淡薄。贫困县榕江县 1995 年每万人中拥有卫生病床数为 12，是同期全省平均水平 17 的 70%；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人口覆盖面为 13.7%，只有全省平均水平 17.5% 和 78.3%，而朗洞镇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人口覆盖面还低于全县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并且，贫困地区多是流行病的原发区和流行区。

3. 贫困地区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地区

全国“八五”期间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在 80% 以上，农村劳动者各类保险覆盖面达 30% 以上，而贵州省 1995 年农村劳动者各类保险覆盖面仅为 11.6%（含郊区菜农），全省 48 个贫困县的农村劳动者各类保险覆盖面在 0~0.2% 之间，即基本上是没有保险的。因此，在我省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者因年老或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温饱问题就难以解决。此外，

由于贫困地区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尚未建立，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社会灾害，脱贫难度加大甚而返贫。

4. 贫困地区基本上是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地区

历史上形成的“官占坝、民占坡、少数民族钻山窝”的民族分布格局未得到根本改变，形成了多元的生产力水平结构和多元文化结构。我省黔北和黔中地区主要是汉族集中分布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较高，文化基础较好，教育也比较发达，是我省贫困县最少的区域，而广大黔东、黔南、黔西地区是我省山区的主要分布地区，是我省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的地区，是我省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在贵州省 48 个贫困县中，位于民族自治州或属于民族自治县的有 37 个，占贫困县数的 77.1%，占全省民族自治区域总县数 46 个的 80.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5 个百分点；再从贫困地区的民族人口构成看，1995 年 48 个贫困县有人口 1805.21 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51.46%，其中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 937.85 万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 75.9%，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贫困地区人口总数的 52.0%。全省 48 种少数民族在 48 个贫困县都有分布，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 9 个少数民族，除回族和白族外其他 7 个少数民族都呈集中连片分布状况，其分布地区都是贫困地区。

5. 贫困地区文化的多元性和多语多文性

从贵州省贫困地区使用非汉语单语的语言分布和人数看：1995 年全省有苗族 370 万人，其中有 240 万人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语言，占苗族人口的 64.8%，这部分人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松桃、凯里、黄平、施秉、雷山、台江、剑河、镇远、锦屏、都匀、丹寨、三都、镇宁等县市，除凯里、都匀和镇远三县市外都是贫困县；1995 年全省有布依族 260 万人，其中有近 80 万布依族人口使用布依语单语，占布依族人口的 31%，这部分人集中分布在黔西南自治州的册亨、望谟及黔南自治州的罗甸等三县，该三县全部是贫困县；全省有彝族 72 万人，其中有 30 万人不通汉语，占贵州彝族总人口 42%，这部分人主要分布在大方、威宁及省西部边缘地区，这些地区全部是贫困地区；全省约 150 万侗族，主要集中分布在黔东和东南部地区，除分布在天柱县、玉屏县和万山特区及其附近的“北侗”（侗族的一个支系，下同）人口通用汉语

外(非贫困地区),集中分布在锦屏、黎平等县及其附近的“南侗”人口中,大约有50万人不通汉语,这些地区全部是贫困地区;1995年全省水族人口34万,占全国水族人口总数的88.4%,我省水族主要分布在三都(贫困县)及其邻近地区,其中有17万人不通汉语,占贵州水族人口的50%。瑶族在贵州的分布比较零星,语言使用情况较为复杂。

从一个贫困县的情况看,是多个民族居住在一起,其民族人口分布和语言使用十分复杂,这无疑增大了在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难度。以位于黔东南自治州剑河县的情况看,1995年全县总人口188690人,少数民族人口占92.13%,其中苗族占56.13%、侗族占33.92%、汉族占7.87%、水族占1.81%,属于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由于地域的封闭性,这些少数民族的交往空间和交往的时间频度有限,长期生活在自己的居住地附近,民族地区的儿童从小都是在他们的社区里向父辈和左邻右舍学说本民族的语言,汉语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而学校的教学语言和书面语言是汉语,这些儿童一入学马上就遇到语言障碍。根据县民委提供的资料表明:全县5000名6—8岁的苗族儿童不懂汉语或汉语水平有限,有3000名6—8岁侗族儿童不通汉语或汉语困难,约200名6—8岁水族儿童不通汉语或汉语水平有限。分别有200个苗族儿童教学班、100个侗族儿童教学班和4个水族儿童教学班需要进行双语教学,这些不通汉语或汉语水平有限的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大部分分布在教学点上。从民族的分布上看,本县的苗族、侗族和水族呈现各自集中连片分布的特征,即各自独立成三个“社区”。苗族主要分布在观摩、温泉、高林、摆伟、稿庞、镇江、久仰、久敢、返排、义仪、白道、高丘、柳富等14个学区,侗族主要分布在潘溪、平珍、南明、大洋、平岑、小广和展模等7个学区,而水族主要分布在展牙和南加2个学区。

贫困地区使用语言的多样性是其社会特征之一,文化多元性也是贫困地区的社会特征。如上所叙,贫困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分布地区,不同的民族不但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也保留和传承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既有本身的传统,又受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影响;既有古老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因素。有些风俗习惯有利于基础教育的普及,有的风俗习惯则与现代教育

观相冲突。

总之,我省贫困地区的社会特征表现为文化的多元性和语言的多样性。而且,尽管一些非贫困地区也存在文化的多元性和流通语言的多样性,但是贫困地区这种多元文化和多语言性在规模和程度上表现得比非贫困地区明显。这决定了在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时**双语教育的规模和难度较一般地区大。**

6、较低的人口密度与分散的聚居形式

人口数量及其聚居形式:如前所叙,贫困地区的经济活动以农业生产为主,因此耕地成为贫困地区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物质条件。由于我省贫困地区丘陵河谷坝子占土地面积的比重低,而且单个坝子的面积狭小,如榕江县朗洞镇的耕地面积为12783亩,其中小于一亩的耕地占73.2%。这就决定了我省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人口分布零星、分散,通过计算该乡的耕地和人口集中化指数分别为14.8%和23.1%,是我国耕地分布和农村人口分布集中化指数较低的地区。表现出来的是农村聚落(自然村寨)小而且分散,它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的办学规模。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学龄人口和总人口数成正比例关系,人口多学龄人口也多。学龄人口多学校规模就大,反之就小。从贫困县剑河县的情况人口密度看,1995年该县总人口数为188690人,人口密度为92.51平方公里,只及同期全省人口密度的43.2%,是我省人口较少的地区之一。理所当然校点规模小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1995年贵州省有小学校点19702所,在校小学生4753439人,平均每校点241.3人;而剑河县1995年有小学校点351所,在校学生27143人,平均每校点77.3人,仅及全省平均水平的32%。从全县范围来看,除村完小及以上的学校规模达到100人以上外,各村教学点的在校人数多在30人左右。究其原因,除与该县人口少学龄儿童相对较少外,与该县人口的聚居方式有关。一个地区即使人口少但居住集中,学校规模班级规模也大;相反人口少居住又分散,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必然小。如上所述,剑河县山地广布而且分布又比较均匀,是一个“九分山、半分土、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传统经济意义上赖以生存及生活的“田、土、水”资源有限(1995年人均耕地0.6亩),并且多均匀撒落在山间洼地、河谷或沟坎边,人们也随这些有限的田、土、水资源而居。因此,剑河县农村人口聚落规

模偏小,在20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撒落着639个自然村寨、近2000个农村居民小组;剑河县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0.31个自然村寨,而全省是每平方公里0.17个。1995年剑河县平均每个自然村寨的居民户为49.9户,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59.6%;1995年全县268个村委会,平均每个村委会1.3所小学校点。这决定了在贫困地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复式教学将会普遍存在。

7.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年龄构成较轻决定了贫困地区“学龄儿童”负担系数较高

除人口数量和聚居形式是影响办学规模的因素外,人口增长方式也是影响初等义务教育的因素之一。贫困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高于非贫困地区,1993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45%,人口自然增长率居前10位的分别是西藏(19.08%)、海南(15.55%)、贵州(14.10%)、宁夏(14.07%)、云南(13.90%)、江西(13.44%)、新疆(13.85%)、甘肃(13.32%)、广西(13.23%)和湖北(13.11%)等省区,除海南、江西和湖北3个省属于非贫困省外,其余7个全部属于全国9个最不发达的省区。1995年贵州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26%,仍然居全国第三位。在贵州省的48个贫困县中有44个贫困县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最高的紫云自治县达到18.16%,四个贫困样本县分别为普定县15.59%、威宁自治县16.84%、榕江县14.73%、独山县15.41%,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33、2.58、0.47和1.15个百分点。

以上由统计部门提供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数据说明贫困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快,事实上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出生人口数仍然大大超过了计划控制数,和全国一样我省各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可能要高于上述统计数据。

由于贫困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贫困地区人口年龄构成较轻,即贫困地区学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要高于非贫困地区。从1995年贵州省部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0~14岁人口比例(根据贵州省统计局提供的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结果)情况看,贫困地区各县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高,通常在30%以上,最高的松桃县达到35.39%,最低的务川县为30.44%;而非贫困地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在30%以下,最低的是贵阳市的南明

区仅为18.39%,是该年龄段人口比例最高的松桃县的一半——51.96%,非贫困地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是福泉县为31.69%。如果将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两组数据分别进行计算得知:非贫困地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8.13%,而贫困地区0~14岁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为32.75%,即非贫困地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贫困地区的85.89%。这种现象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0~14岁人口为非劳动人口,0~14岁人口比例越高社会、家庭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负担系数就越大。从下列几个县人口年龄构成指数中的总负担系数和负担少儿系数的高低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问题。赤水市基本上代表贵州省的平均水平,剑河县反映贵州省贫困地区的平均水平,南明区和松桃县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贵州省经济最发达的县区之一的南明区人口总负担系数(非经济人口——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与经济人口之比)为34.88%,而贫困地区的松桃自治县为71.72%,是南明区的2.06倍!南明区的负担少儿系数为24.08%,松桃县的负担少儿系数是60.77%,是南明区的2.45倍,就是说松桃县0~14岁人口的生活质量要达到南明区的水平,则对这部分人的投资水平相应要提高2.45倍!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能力上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在人口经济学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怪圈:贫困地区经济上越穷,人口自然增长率越高,需要接受初等义务教育的人口比例就越高,需要政府和家庭支出的教育费用就越多。贫困地区的人口问题使得贫困地区的教育需求和教育投入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由此矛盾引发了贫困地区在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中的种种问题。

8.贫困地区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素质是指在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一定社会制度下,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以及人的身体素质。由于人口素质是德、智、体多方面的综合体,目前还没有一个指标能够全面综合地反映一个地区人口的素质状况,一般都把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或者15岁及其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所占的比例作为衡量总体人口素质的主要参考尺度。从1995年贵州省各县文盲半文盲率的统计情况看出: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率较高,一般在30%以上,最高的赫章县达到54.13%;非贫困地区文盲半